

东方研究

论文集

PAPERS ON

ORIENTAL STUDIES



东方研究论文集

1987

北京大学出版社

270
东方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30千字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600册

ISBN 7-301-00326-9/H·033

定价：4.50元

目 录

室利佛逝及三佛齐试探(上).....	王任叔(巴人)(1)
阿朗帕耶与缅甸第三次统一.....	赵 敬(17)
日本佚存汉籍述略.....	谢孝苹(32)
佛教传入日本时间再探讨.....	钱文忠(51)
吴哥古建筑艺术管窥.....	傅学章(59)
河内语音音位系统的确定.....	利 国(68)
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	汪大年(86)
泰语中的潮州话借词.....	傅增有(105)
蒙古语中的谐音词组.....	倪申源(120)
印地语jo的用法.....	殷洪元(132)
印尼语词缀的特点及作用.....	居三元(156)
加岱诸语言在原始分类中的地位	〔苏〕雅洪托夫(187)
略论东方文学的成就和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梁立基(192)
伟大史诗《罗摩衍那》的艺术特色.....	唐仁虎(204)
现实主义的杰作 ——评德钦妙月的小说《如愿》.....	姜永仁 韩德英(219)

生活的画面 情感的浪花

——试论艾·纳·卡斯米早期短篇小说的成就

.....唐孟生 孔菊兰(232) >	
契·洛道伊丹巴的短篇小说.....史习成(239) >	
茶山丁若镛的文学.....朴忠禄(247) >	
邵基民族主义简论.....张甲民(259) >	
伊克巴尔诗中的伊卜利斯的形象.....李宗华(270) >	
阮廷炤和他的《蓼云仙》.....卢蔚秋(283) >	

室利佛逝及三佛齐试探(上)

王任叔(巴人)

编者按：王任叔(巴人，1901—1972)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太平洋战争期间流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1948年曾出版《印尼社会发展概观》一书。五十年代末身处逆境后，他转而致力于印度尼西亚历史的研究，著有《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以及有关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论文多篇。可惜这些著作未及问世，他就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他的遗稿正由周南京同志整理。本文是遗稿之一。

研究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的困难就在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古代留下的石刻、碑铭或者尚未全部发现，或者虽有所发现但一时还不能释读。故不能不借助于外国(尤其是中国)的记载。这些记载实为法国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的重要资料。1922年出版的费邨《苏门答腊古国考》，就是这类书籍的一种。冯承钧将此书译成中文后，又成为中国研究室利佛逝及三佛齐王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但仅仅征引外国资料而不更多地参照本国的石刻和碑铭，必然会与史实有重大出入。再者，主观臆想往往导致作者将与研究对象本来无关的事物牵强而附会之，以期汇集于一地或一身。例如《苏门答腊古国考》因392年迦留陀伽译《十二游经》中有“第四王名阇耶，土地出荖茈胡椒”语，遂考证阇耶为毗阇耶的省文，即为室利佛逝国。但根据巨港附近塔当(Tatang)河畔克杜坎

武吉 (Kedukan Bukit) 所获得的碑文看, 室利佛逝王国建立的确切年代应为公元683年, 即义净于咸亨二年 (671年) 抵达佛逝的时候, 该王国尚未建立。但义净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大约撰写于689年至695年之间, 后日追记往事, 以其初到时之地名为佛逝也未始不可。如果据此判断室利佛逝王国在671年已经存在, 那就错误了。

再说, 象《苏门答腊古国考》的作者, 尽管“鸠集汉、梵、巴利、大穆、波斯、吉蔑、暹罗、爪哇、马来、大食、葡萄牙诸文, 综合考之, 其用力甚勤”, 但它终究未能回答如下问题: 室利佛逝王国是怎样兴起的? 它是怎样性质的国家? 它是印度人的殖民王国, 还是接受了印度文化的一个印度尼西亚部落建立的国家? 如此等等。因而它也很少有助于我们对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认识。这里试图根据一些碑文及其他资料, 略抒己见, 以供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者的参考。

二

中国载籍中第一次提到室利佛逝的, 恐怕就是义净所自述的去印度的行程。他决定去印度是在咸亨二年。他说: “至十一月遂面翼轸, 背番禺, 指鹿园而遐想, 望鸡峰而叹息。于是广莫初飙, 向朱方而百丈双挂, 离箕创节, 弃玄朔而五两单飞, 长截洪溟, 似山之涛横海, 斜通巨壑, 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 果至佛逝, 经停六月, 渐学声明, 王赠支持, 送往末罗游国 (今改为室利佛逝也)。后停两月, 转向羯荼。至十二月, 举帆还乘王舶, 渐向东天矣。”

这一记载中清楚地说明, 当义净于671年到南苏门答腊时, 末罗游还是个独立的国家; 而当义净于682年或683年重返该地时,

或者是当义净写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约在689年和695年之间），末罗游就为室利佛逝所征服了。此其一。其次，当义净于671年到南苏门答腊时，其所谓“佛逝”的室利佛逝国是并不存在的。记载中所谓“果至佛逝”者不过是追记往事，袭用现名而已。这有683年石碑可以作证。那么，这里该是个什么国家呢？而且这个国家还是进行海上贸易的大国。在那里，印度文化已经非常兴盛了。如果去印度，要懂得梵文语言，还需首先在这里学习梵文文法。义净就是在那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了“声明”之学，即梵文文法的。这个王国似乎定期由国王统制的商船和印度通商。义净乘所谓“王舶”到了末罗游（即今日的占碑），停了两个月到羯荼（即今日的吉打），再乘“王舶”去印度。这说明这个王舶是在末罗游和羯荼两次靠岸收购当地产品运到印度去的。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不说是当时海上贸易的强国之一了。但它究竟是个什么国家呢？

中国隋代有个杜薄国。“在扶南东涨海中，直海渡数十日而至。”可以直海而渡，而又“数十日而至”的，航程和义净所乘的船是一致的。这个杜薄国不能不是在南苏门答腊，而这个杜薄国确实也是很富庶的。“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华布，出金、银、铁。以金为钱。”可见商业是相当发达了。但这个杜薄国又有“十余国城，皆称王”。看来不是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是由各个部落联合起来的“联邦式”的国家。这和人们在那一带所发现的巨石文化的历史传统颇有吻合之处。如果是个由各部落联合起来的国家，那就不大可能是印度人的殖民王国。但也无疑可以说：印度人在该国的势力是很大的，不仅佛教文化已相当深入，而且梵文语言已成为各国商人旅客的一种交际语了。那么，这个国家是否即是梁时的干陀利国的继续呢？这很难确定。因为干陀利可能是诃罗单国的后继者，末罗游国的前身；但也有可能是在马来半岛上，即羯荼国的前身。可是干陀利看来不象是有

“十余国城，皆称王”的这种国家组织。

我们已经提到过末罗游这个国名，在公元644年已见于中国史册。《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九有云：“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二月，摩罗游国遣使贡方物。”摩罗游也即义净所谓的末罗游（Malayu），即在今日的占碑地区，位于巴当哈利河畔，提加普罗山脉之阴。在那里人们已发现了一座属于六世纪艺术形式的大的石佛立像。它未必是诸薄或杜薄国的城国之一。但也有人认为诸薄和杜薄的得名，是由于巴当哈利河中段有个德博（Tebo）地方，即穆阿腊德博（Muara Tebo）。这种凭今日的地名探索古代国家的方法未必可靠，我们很难予以肯定或否定。另外，我们在《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二十二年（648）下找到这样的记载：“是岁，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远夷十九国并遣使朝贡。”这里的鼻林送，有人认为送字可能是进字之误。如果是鼻林进，那就应该是指以巨港区为领地的国家了。鼻林进即为Palembang的对音。但有人认为淳淋邦（巨港）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麻喏巴歇王朝征服末罗游之后，即成书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第一次称之为巨港的。可是人们从字源学指出这一名称的来源：Palembang这个名称来自Limbang这个字根。它的原义就是“淘洗”。因为在克杜坎武吉河的对岸，有条奥甘（Ogan）河。在那河的河口的沙岸上，曾发现过金沙。在那里命名为Palembang，意即是以淘洗金沙为生活的地方^①。这和诸薄或杜薄国出产金子的说法又相吻合。因之，当这由十余国城联合起来的杜薄国分裂时，在今天巨港区域的一个部落以鼻林进（或淳淋邦）的名义来同中国通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上述这些探索，我们只想说明这样一点，大概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个为中国隋朝所知道的杜薄国，已经衰落或者分裂了。而室利佛逝王国多半是在这一种历史背景中兴起的。

三

迄今为止，人们在巨港区域发现了不少室利佛逝王朝的石碑和石碑断片。室利佛逝王国最早的都城是在巨港区域这一问题是再也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在这些石碑和石碑的断片中，以巨港附近塔当河畔克杜坎武吉所发现的石碑为最古。石碑碑文的特出之点已和四世纪前后发现于占婆、扶南、马来亚的吉打、爪哇的西部和加里曼丹的东部有所不同。虽然它也是用拔罗婆字体书写的，但所用的语言，已不是印度的梵文，而是以当时当地的口头语为基础，掺杂着梵文的一种古马来文，大概也就是义净所称的当时通用于南海各地的所谓昆仑语。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即当地居民已经在接受了印度文化之后，开始成长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并且运用了自己民族的文字。

克杜坎武吉是在巨港城的西南西贡当（Seguntang）山山脚的一个丘陵，石碑就是在那里发现的。碑文一共有十行，可以说是宣布室利佛逝国的建立的。但自第八行起，有两处残缺，以致要探索这个国家的建立碰到不少困难。碑文大意如下：

维塞迦606年（公元683年）吉祥之年，吠舍佉月（Vaiśākha）白分11日，大头领希扬（Dipertuan Hyang）登上了船舶，作神圣的远征（Siddhayatra）。在逝瑟吒（Jyastha）月白分之7日，大头领希扬自米南加坦万（Minanga Tamwan）出发，率领二万兵士及二百件行囊，用船舶载运。另有1312名兵士，循陆而行。

在……月5日欣然到了马塔亚普（Mata Yap）……由于顺利而愉快地到达，乃筑一城……并且为了神圣远征的胜利和为了繁荣……〔名之曰〕室利佛逝。……②

十行以后残缺。

近来有人研究了得之于巨港的残缺的碑文碎片。有一块标明

为正号破碑，是得之于“石塘”（Telaga Batu）的。只在中间部分留下些文字。发现这破碑至少有一部分文字是同克杜坎武吉碑文相合的。但它较克拉坎武吉碑文增加了一些文句，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破碑的第六行有一个颊沙茶（asada）字样，紧接于“欣然”（碑文lagamudita，印尼文bersukacita）之上，因之我们可以知道它到达马塔亚普的日期了。^③这样我们可以算出它的行程的日期。

第一次出发，吠舍佉月11日到第二次出发逝瑟吒月7日，为25天。第二次出发逝瑟吒月7日，到颊沙茶月5日，为28天。这一船程日期的了解，对这位大首领希扬来自何处是相当重要的。

《印度尼西亚史话》的作者把碑文中Siddhayatra这个词译为“神圣的远征”。对这个词有的解释为一种“获得魔力”的旅行，有的认为是一种放出鸽子探寻大陆的商业性航行。我认为《史话》作者的译法和后面所记述的事是相照应的，可以说是正确的。

但那位作者解释这碑文时，认为这支队伍是来自米南加保的，就不免勉强了。他注意到Minanga Tamwan这个地名，并从字源学加以解释，认为Tamwan就是古爪哇语“汇合”之意，即现代爪哇语的Temon。Minanga Tamwan就是两条大河的汇合处。现在在甘巴（Kampar）河上游有右甘巴河和左甘巴河。Kampar实即Kamwar之转，而今日的Minangkabau（米南加保）实即Minangakamwar之转。因为还有人把这条大河叫做Minangakamwar的。并且还说，正是在左甘巴河和右甘巴河交接之处，有一个叫穆阿腊塔库斯（Muara Takus）的地方，还有大乘佛教的遗址。于是便解释说，从前有个大人物，带了两万多的士兵，从米南加保出发，实行征讨，于占碑稍停（他以Mata Yap即为Malayu），直下巨港，获得胜利，因而建立一城，名之为室利佛逝^④。

但正如有人指出的，碑文中的Tamwan，决非古爪哇语的Temwan，以后衍变为Temu；因为在巨港的塔朗土沃(Talang Tuwo)的碑文中，Temu这个词早就出现了。所以Minanga Tamwan解作河口更为适当。《史话》作者把大首领两次出发解释为一次出发也是不对的。⑤

同时，上述那块碎碑上大约是第八行地方还看出这样的句子“vihara ini di vanua ini”，意思是“这个寺院是在这个地区里”，这使人想到还有不为我们所知道的第四个日期。⑥

我们也不能同意《史话》作者所作的解释，这支有二万多士兵的队伍，决不可能是从内陆地带米南加保来的。他作为唯一证据的是穆阿腊塔库斯就有大乘佛教的古迹。但就是在那里，史涅格(F. M. Schnitger)在《在苏门答腊被遗忘的古国》一书中指出：所有建筑残址都是属于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最早也不会超过十世纪，正是室利佛逝(或三佛齐)兴起后的建筑。中国《宋史》所载的承天万寿(Candi Bungsu)寺就在那里。但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碑文中所谓Siddhayatra，那是一次征服淳淋邦的远征；室利佛逝王国的出现是在塞迦纪元605年，即公元683年。建立这个王国的人，最初还只是一个部落的首脑人物，即被称为大首领希扬的，而不是什么国王。就是这个大首领希扬第一次出发，隐去了出发地点；第二次出发是在米南加坦——一个河口，很可能就是占碑的英得腊其利河之口，在那里，这位大首领同两万多的兵士会合了。于是派遣1312名兵士，沿陆而行，作先遣队伍；另有两万名士兵及行囊乘船沿海岸南下。可以推想，要是有两万多士兵在内河航行，是比陆行更困难的；既有陆路可通淳淋邦，是无需用船舶载运这两万多士兵的；只有海路航行，用大船舶载运这两万士兵，才较陆行便利。他们就是这样水陆并进，进入淳淋邦的。他们在颚沙茶月的第五日，到达了马塔亚普。这个马塔亚普，不会是末罗游，早有人指出它的对音

不谐。我们认为最有可能是 在穆西 (Musi) 河口或在穆西河下流的一个地方。如果, 象有人指出还有第四个日期, 并且提到了一个寺院, 那么就在那块破碎的 E 碑发现的石塘附近, 人们确实发现过一所古代寺院的遗址。他们很可能于战争结束以后, 在那寺院里举行祝捷祭。

我认为上述的解释是合乎碑文本身的示意的。

那么, 这个所谓大首领希扬是打从哪儿来的呢?

是的, 这一碑文确实使人不能不提出这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作神圣远征的大头领不提出第一次出发地点? 又为什么连自己的姓名也不在这个碑上出现, 而只以 仅仅 是一种“尊称”的 dipertuan Hyang 出现呢 (dipertuan Hyang 也等于 yangdi pertuan Hyang, 是首长阁下的意思)? 为什么只是在一年以后, 在另一个碑上, 才出现了室利·雅亚纳加 (Sri Jayanaga, 意译为龙精) 这个名字。我认为, 碑文的这种写法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而是有意这样办的。很可能这位大头领是某一国家的一个部落首领, 他举行叛乱失败了, 就率领部下离开那个国家, 到一个地方会合后, 他就实行对新领土的占领。他的力量还没有巩固时, 他既不宣布自己所从来的地方, 也不宣布自己的姓名。就碑文所用的文字来说, 这个部落也只能在使用马来语的居民区域中去寻找。据对古爪哇语和古马来语有研究的人说, 二者虽然被中国人通称为昆仑语, 但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克杜坎武吉碑文却是古马来语。同时, 这个叛变的首领还是信佛教的, 一定是从当时一个佛教王国中叛变出来的。从叛变者所使用的文字夹杂着一些梵文看, 那一叛变部族是深受了印度文化影响的当地土著。从碑文所记的行程看, 从第一次出发到第二次出发是 25 天; 如果另一碑文碎片所补充的年月是正确的, 那么从第二次出发到达目的地是 28 日。两次之中, 主要都是船舶载运的。而第二次又有两万多人由船只载运而来。这正如上述, 不大可能是在内河航行。第

一次虽然只讲到大头领的出征和登上了船舶，没有讲到他所率领的两万多士兵，这说明在他们匆促的逃亡中是按照当时通行航路进行的。因之，他们到了象占碑那样的巴当哈利河出口的分岔地方便得以汇合了。按照中国《诸蕃志》记载的室利佛逝（即三佛齐）第一个国王的传说，有这样一段记载：“俗号其王为龙精，不敢谷食，唯以沙糊食之，否则岁旱而谷贵。”但《岛夷志略》对于巨港却如此描写：“田利倍于他壤，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其谷变而为金也。”这和《通典》所说杜薄国多种稻谷是一致的，所以国王龙精并不是因为恐“岁旱而谷贵”才食沙糊（即西谷），事实是习惯于吃沙糊的缘故。那么，这个部落的首领，大致还是从稻田耕作不很发达的区域来的。

凡此种种，都可以使我们去探索这支两万多的远征军之所从来，即一，它是从一个大国的部落中来的，二是从马六甲海上来的，三，这个部落是当地的土著，四，这个部落是并不太多生产稻子的。

那么，当时的大国有哪些国家呢？按照义净的记载，当时苏门答腊岛上有两个大国：婆鲁师国和末罗游国（后归并于室利佛逝国）。而在马来亚半岛上，则有狼迦戍国（大致在克拉地峡一带），有羯荼国（即在今日的吉打）。有人认为义净所记之南海十洲中的坦坦国，即在今日的吉兰丹，盆盆国即当时在暹罗的盘盘国。这显然和他自“西数之”的说法相违，而且也和他依“洲”为岛的用语相反。否则在他的十洲中是不会不写上他所熟知的堕罗钵底、狼迦戍和羯荼等国的。

从中国的史书来看：在隋时，马来半岛上有一个大国，叫做赤土国。但到唐时便不存在了。公元607年，隋炀帝曾遣常骏和王君政往访赤土国。《隋书》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在“炀帝本纪”中还说，公元608年、609年和610年赤土曾三次派遣使节到过中国。按照“赤土传”的说法：“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

不知有国远近。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悬金花铃眊。妇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这就可以看出：国王是印度人的后裔，所信仰的宗教是佛教。但又说连国王也不知国之远近。足见赤土国是一个合并各部落而成立的大国。所以它“每城置‘那邪迦’（Nayaka）一人，钵帝（Pati）十人”，以便统治。而国王又“曾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足见所有各部落的“那邪迦”是王子担任的。按照《新唐书·盘盘传》的说法，那个国家在外州的官叫“那延”（即那邪迦的简译），“犹中国刺史也”。这就是说，他们是国王派去镇压各部落的地方官吏。象这样一个强加在各部落之上的异族统治的国家，是不能不引起经常的叛乱的。赤土国到底在什么时候瓦解，我们不得而知，但七世纪中叶，这个国家肯定已不存在了。而义净于671年到佛逝时，在马来亚西海岸是只有羯荼国堪称为大国。

那么羯荼国是否就是赤土国呢？有人考证赤土国在今日的宋卡一带，并且认为僧祇城就是Singara。有人又从吉打所发现的一块梵文石碑上有Raktamrttika的名称，认为这就是赤土国的国名。当时有一船主佛陀笈多（Buddhagupta）曾居留其地。另一块石碑据说是以“令人追忆到六世纪时德干高原和真腊碑铭的字体”。因之认为赤土的建国，或即在这个基础之上。但就常骏所记航程地志来说，以赤土国在宋卡一带也未可厚非；唯谓其王城即在宋卡，则与于国境内迎接隋使后“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所叙述不合。这就是说，常骏等上岸以后，陆行需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其国都必在半岛的内陆东甚至偏于西海岸。因之，所谓赤土国者，当时可能是西起吉打东迄宋卡。早有人认为古代自吉打至宋卡也和克拉地峡一样，也有横贯半岛的通路的。

我认为，这个建立室利佛逝国的大头领可能是从赤土国分裂出来的一个部落首脑。我们不能确实知道这个部落在赤土国的哪个地方，但从室利佛逝国以后发展的几十年中，非常注意马来亚北部一带，似乎和它所从来的故乡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人们在吉打邻近的霹雳地方，发现过八世纪时室利佛逝的铜佛像，而在今日的六坤地方又发现一块775年室利佛逝王国的石碑。固然，这是室利佛逝扩张的结果。但那些地方是室利佛逝首先伸张势力的区域，可以供人思索的。

在后面还要谈到国家的建制方面，我们又发现和赤土国的建制有基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以各原来的部落为基础，而派王子作为监督的国家制度，是和赤土国的建制基本相同的。

四

室利佛逝王国建立后第二年，又在今天巨港的西面塔朗土沃地方建立了一块石碑。碑文大意如下：

唯塞迦纪元606年（即公元684年）制坦罗（Caitra）月白分第二日，此祇树给孤独（Sriksetra）园于此时得以建立。建立此园，乃奉大首领希扬·室利·雅亚纳加（dipertuan Hyang Sri Jayanaga）之命令。是亦为实现大首领希扬之许愿者。于此应种植各种作物：椰子、槟榔、枕榔、西谷及各色果树。尚须种植天竹、毛竹及其他等等，尚须开辟其他园林：有池塘及湖沼。凡此一切，用以改善一切人等生活，并冀有利于一切众生之繁荣。凡此众生不论其遵行（命令）与否，皆应使其欢悦。唯有如此，庶能使在饥荒年月或外商旅客，足饮足食。务使一切旱地与农园，足以资一切种类之牲畜、奴隶，并使之繁殖，切勿随意施加阻挠或暴虐，并干涉彼等睡眠。一切人等均须依照上述宗旨行事，不作恶事，不损害工作，一切眷属只须忠诚而服从。对朋友之妻，

不得调戏，若其妻忠于其夫者。不论何时何地，不得举行叛逆、中伤或杀人，不得通奸。务必相互友好，各以敬爱之心，对此菩提之树，建立信念。务须敬爱三宝（即佛、法、僧），勿与三宝分离，常行布施，持戒，忍辱，精勤振奋，获知一切种类技能；时时敬修，获得智慧、记忆及明澈之菩提心。有坚如水晶之心，金刚不烂之身。祛除疾病，欢乐无量。尚须修前生记知，诸根不缺。获得完满功德：安乐、欢悦、慧悟及梵音。如此使能成为独立自由之男子，成为如意珠积聚之山，克服生、业与烦恼，然后，终得无上现正等觉。⑦

这一碑文告诉我们的是：（一）室利佛逝王国所信仰的是大乘佛教。所谓要尊重佛、法、僧三宝就是一个例证。（二）所谓祇树给孤独园（或译放生园），实际上就是一种僧侣公社即僧伽的组织。这种僧侣公社组织，在以后年代里大概有相当的发展。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曾经谈到（详后）。（三）但它按其本质说来，却是僧侣奴隶主庄园组织。这种僧侣奴隶主庄园，是在室利佛逝第一次出现的；但在八九世纪间则盛行于爪哇，而名之为“自由土地”，即可以不向国家纳税的土地。我们只要从文中对牲畜和奴隶并列，并且说到能敬三宝，行善事，忠诚，工作得好，男子便可以独立自由来看，可以肯定所谓“放生园”或“祇树给孤独园”以及僧迦等等，不过是僧侣奴隶主庄园罢了。

但这种僧侣奴隶主庄园的建立是有它客观需要的。在第一块碑文中，我们看不到室利佛逝征战的情况。但事实上，它是经过激烈的战争的。战争中的俘虏就成为这种僧侣奴隶主庄园的社会基础了。

上面提到过不久前发现五块室利佛逝碑文的碎片。其a号是得之于西贡当山上的。一共有20行文字，每行都残缺不全。但可以看出有几行讲到了战争。例如第十行中就有“在战争的行列中不知有多少人倒下去了”，这似乎是指敌人的军队的。第五行则有